

框架整合与话语构建： 台湾地区“太阳花”运动的动员机制

艾明江^{1 2}

(1.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博士后流动站 福建 厦门 361005; 2. 中共厦门市委党校 福建 厦门 361027)

摘要:情感、话语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组织者经过特定的“框架整合”,能推动共同情感、话语的构建,最终产生集体行动。本文研究发现,在“太阳花”运动过程中,“反服贸”人士使用了某种特定的“框架整合”模式,分别包括了“诊断框架”、“处方框架”以及“动机框架”,将原本分散的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等进行了有效整合,并构建起认同和支持“反服贸”运动的情感、话语,从而推动了“反服贸”运动的爆发。当然,“反服贸”人士之所以能使用情感话语动员台湾大量青年学生参与“反服贸”运动,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中,青年学生与社会运动所构建的情感话语产生了共鸣。

关键词:服贸协议 “太阳花”运动; 社会动员

中图分类号: D432.8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7)04-0010-07

DOI:10.14157/j.cnki.twrq.2017.04.002

一、问题的提出

台湾社会运动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因此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从20世纪70年代起,台湾社会运动的政治化属性十分显著,诸如劳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教师人权运动等都与政治民主运动关系紧密,^[1]尤其以“野百合运动”为标志的社会运动甚至成为推动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到了90年代,随着台湾民主体制的逐步确立,追求民主政治不再是社会运动的唯一主题,同时,支持社会运动的政党也开始更多在体制内展开政党竞争,台湾社会运动开始逐步“去政治化”。这个时期的社会运动基本关注较为中性的民生议题、发展议题、环境议题等,^[2]诸如反“核四”运动^[3]、反“国光石化”运动^[4]等。进入到新时期,伴随着公民意识的成长,以“红衫军”运动、“白衫军”运动、“太阳花”运动为代表的社会运动已经开始展示台湾“公民力量”的崛起。

对于“太阳花”运动,其动员的背后到底是源于政党暗中操控,公民认同政治和阶级意识的影响,^[5]还是借助新媒体的运用和帮助,^[6]抑或是其它的动员策略提升了成功的可能性?^[7]以上研究都从一个侧面提出了“太阳花”运动的发生机制。与以往的社会运动不同,“太阳花”运动更像是一场无政党、无组织化运作的社会运动,^[8]却爆发了惊人的社会能量。一般看来,社会运动一旦缺乏有效的组织运作,必然会影响社会运动的发生,也会带来社会运动模式的差异。但是,“太阳花”运动却依靠少数人的运作实现了大规模青年学生的参与,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太阳花”运动到底是如何成功吸引台湾青年学生的响应和参与?运动是否存在一个动员框架来构建社会运动与青年学生的互动关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台湾社会运动进程中网络社群对青年学生的民意动员研究”(17BXW074)

作者简介: 艾明江,男,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中共厦门市委党校统战理论教研部副教授。

系? 本文试图从情感、话语的研究视角做出新的解释, 尝试说明“太阳花”运动如何构建一套自身的运动话语模式来实施“反服贸”的动员整合。

一般而言, 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 可以概括为三个因素: 变迁、结构与话语。具体而言, 变迁指社会变化, 结构指国家结构、社会结构, 话语指意识形态、认同、观念等。^[9] 本文试图借用社会学的“框架整合”概念, 从话语层面考察“太阳花”运动的发生机制。美国学者 D. A. 斯诺等人借用了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框架理论,^[10] 提出了适应社会运动的“框架整合”概念, 即把若干具有相近的意识形态、价值或目标的组织通过运动目标和策略的改造而联合起来。^[11] “框架整合”的核心思想就是: 一场社会运动背后的目标或意识形态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不为动员目标群体所理解或接受, 因此, 为了推动社会运动的发展, 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会创造出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 既可以实现运动的正当性, 又能达到有效动员的目的。在本文研究中, 鉴于“太阳花”运动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符号, 运用“框架整合”理论来分析“太阳花”运动的发生机制就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组织者的框架整合

D. A. 斯诺和本福德认为要成功动员参与者, 动员者就需要在框架过程中运作三项任务: 用以确认问题和归咎对象的“诊断框架”; 用以提供问题的方案、建议和策略的“处方框架”; 用以论证行动合理性的“动机框架”。^[12] 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论述“反服贸”运动框架的构建过程。

(一) “诊断框架”: 构建“反服贸”运动的认知逻辑

在斯诺等人的“框架整合”概念中, “诊断”是对某种事件或社会问题的性质进行定位分析。通过“诊断框架”的构建, 组织者可以初步构建社会运动的认知逻辑, 为参与奠定行动基础。在“反服贸”运动中, 组织者的“诊断框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 将“服贸”塑造为大陆方面的“政治统战”

在“反服贸”人士看来, “服贸协议”不仅是一个经济议题, 更是一个政治议题, 大陆和台湾签署“服贸协议”, 不仅要在经济上让台湾向大陆靠拢, 削弱台湾的经济自主性, 更是在政治上为两岸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反服贸”运动组织者之一“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就坚称, “服贸协议不只是经济问题, 更是政治问题, 当台湾的经济自主性开始被蚕食, 未来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将受制于掌握经济的特定团体。”^[13] 这种政治认知不但将经济议题政治化, 更是一直以来岛内极端“反中”思想的体现。《自由时报》就提出“大陆不是一般贸易伙伴, 台湾不但不能以正常国家待之, 服贸尤非只是寻常的贸易协议”。^[14] “反服贸”人士将“服贸”议题政治化, 认为“服贸”是大陆方面展开的“政治统战”, 其根本目标是实现两岸从经济整合到政治整合, 这种认知逻辑构建起了“反服贸”运动话语的基础, 不但容易引发社会舆论关注, 更能挑动台湾内部的社会情绪。

2. 将“服贸”塑造为国民党与大财团的操控

制造国民党代表所谓“权贵”与财团利益的社会认知容易引发社会的负面情绪。“反服贸”人士就将“服贸协议”制造成是国民党、大财团私下与大陆协商的结果。“我们不愿看见我们未来的生活掌控在这些少数权贵统治集团手里、我们不愿我们的工作都被大企业家、被跨海峡资本家控制; 我们要掌握我们自己的未来, 我们要的是一个给年轻人公平发展和竞争的环境与机会!”^[15] “我们正活在黑色岛国之上, 我们过往与现在所珍爱的一切, 在失控的发展主义狂飙、政策走向短线操作, 以及跨国政商集团的利益勾结下, 正一步步走向腐败。”^[16] 其认知逻辑就是: 岛内特定政党与财团联合起来操控了“服贸协议”, 它是两岸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相结合的产物, 损害的是台湾大多数中小企业、中小阶层的利益。这种“少数阶层对多数人的利益损害”论述很容易制造社会对立。

3. 将“服贸”塑造为大陆对台湾利益的损害

“反服贸”人士公然声称“大陆资本会损害台湾利益”, 其中暗藏对大陆的抗拒甚至敌意, 由此激发岛内民众对大陆的恐慌情绪。对于组织者而言, 公然制造“反中”, 必然会涉及敏感的“统独”议题。

为了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响应,组织者尽量避免直接使用“台独”与“反中”话语。在公开场合,“反服贸”人士都对“逢中必反”加以否认,试图争取多数民意支持。“反对服贸不是‘逢中必反’,服贸最大的问题在于,自由化下只让大资本受益,巨大的财团可以无限制的、跨海峡的扩张,这些跨海峡的财团将侵害台湾本土小型的自营业者。”^[17]在这里,“反服贸”人士将“反中”巧妙地包装为少数大资本对岛内弱小群体利益的损害,这既是一种对经济自由化与社会财团化的抗拒,也能唤起岛内民众对大陆方面的防范,这种植入了“恐中一反中”情绪的认知逻辑成为构建“反服贸”运动的基础。

(二)“处方框架”:构建“反服贸”运动的行动策略

“处方框架”指的是在社会运动中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社会运动活动是一种公开努力,针对政府当局持续性的、有组织的提出要求”。^[18]“反服贸”运动的行动策略就是:号召占领立法机构,扩大舆论影响,迫使“立法院”停止审议“服贸协议”。

1. 号召台湾民众反对“服贸”

“反服贸”组织者以所谓台湾民众代表自居,动员民众通过抗议等形式直接参与“反服贸”运动。在“反服贸”人士看来,执政的国民党控制了行政与立法资源,反对者很难从体制内对“服贸协议”施加实质性影响,因此,“反服贸”运动就逐步走向体制外的发展道路。所谓“体制外”就是号召民众走上街头,发动社会抗议。当时“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就公开呼吁“台湾人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我们代表人民夺回立法院”,“在野党加入我们”,“马英九到立院回应民意”。其还提出“我们看到上万台湾人站出来,表达对台湾未来的忧心,坚定地捍卫民主。我们看到,全国各地、世界许多地方的人民,自发响应行动。人民团结起来,展现力量,展现希望。”^[19]参加“3·30反服贸”大游行的抗议人数达到了数十万人的规模。

2. 给台湾当局制造舆论压力

“反服贸”人士通过广告传播、专家论述、新媒体直播等方式,推动“反服贸”舆论升级。为了扩大舆论影响,宣扬“反黑箱服贸”观念,“批踢踢乡民”通过群众募资平台 flying V 募款,3个小时就有3,600人集资690万新台币,用以在《苹果日报》《自由时报》《纽约时报》刊登广告。^[20]这种传播直接让“反服贸”舆论从全岛扩散到国际社会。组织者还邀请部分岛内专家、知名人士等发表“反服贸”言论。“反服贸”人士善于利用新媒体来制造舆论,尤其是岛内社群媒体成为“反服贸”的宣传大本营。在抗议现场,当传统媒体被警察阻挡在外,抗议学生用手机记录实况,将现场影像上传 Facebook 与 Youtube,制造公权力打压抗议人群的印象,从而激发岛内社会舆论对抗议学生的同情和支持。

3. 要求“立法院”重审“服贸协议”

“反服贸”人士多次要求“立法院”对“服贸协议”进行“逐条表决”,并且要先进行公听会,才能进入审查程序。2014年3月17日,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以30秒宣布“服贸协议”视为完成审查生效,这一举动被“反服贸”人士视为违反程序民主,是在搞“黑箱”操作,不可接受。“我们不是反服贸,而是反‘国会’违法,反国民党不尊重‘国会’和民意恶劣态度。”从2014年3月18日开始,抗议人群冲击“立法院”,瘫痪了议事活动。当时,“反服贸”人士公开提出了三大诉求:要求行政当局将“服贸协议”议案退回到立法机构;推动“立法院”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要求召开所谓的“公民宪政会议”。“反服贸”人士试图让“立法院”无法通过“服贸协议”,并通过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形式来对两岸协商进行更多的约束与控制。

(三)“动机框架”:构建“反服贸”运动的动机逻辑

所谓“动机框架”指的是在框架过程中构建基本的参与动机,赋予社会运动正当性与合法性。在“反服贸”运动中,组织者的主要动机有三个:保障安全的动机、维护程序正义的动机、捍卫民主权利的动机。

1. 保障安全利益的动机

“反服贸”人士认为“服贸协议”内容存在经济方面的利益损害,即“服贸协议”会给台湾部分产业和中小企业带来不利。在“懒人包”的传播中,“反服贸”人士反复强调“服贸”对台湾经济造成的负面

冲击。“未来,台湾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即将面临资金充裕、整合上中下游一条龙模式的中资企业来台竞争,不管是上班族、小农、工人、商人,生存都将面临威胁”。^[21]他们还刻意渲染台湾与大陆的政治对立,即认为“服贸协议”会导致台湾过度“亲中”,从而使得台湾越来越依赖大陆,在两岸尚未正式结束政治对峙的前提下,这种依赖性会提升大陆带给台湾的政治不安全感。这种穿着“反服贸”外衣的话语,容易激起台湾从“反共戒严”到本土意识历史地形成的“恐中反中”想象。^[22]

2. 维护程序正义的动机

“反服贸”人士认为“服贸”审议程序不公正,不能代表全体台湾人民意志,因此,“反服贸”就是为了捍卫程序正义。“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等团体坚称,“服贸”虽然是问题的核心,却不是运动的主题。他们反的不是“服贸”,而是审理服贸过程的“黑箱”作业,即“服贸”审议程序没有实施“逐条审查”和“实质审查”,甚至整个过程都缺乏透明化。通过对议题注意力的转换,将单纯的“服贸”内容转移到审查程序上,并以“黑箱”来反复渲染审查程序的不合法性。由此,不仅可以大大提升“反服贸”运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能借此批判国民党在“服贸”审查中的瑕疵,从而赢得社会舆论对捍卫程序正义的响应和支持。在台湾部分青年人心中,“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等社会组织先后参与发起了“反媒体垄断”运动、“监听国会事件”等多次社会运动,已经构建起“弱小对抗强者”的“正义”形象,容易获得青年群体的情感共鸣。

3. 捍卫民主权利的动机

“反服贸”人士提出的主要口号是“退回服贸,捍卫民主”,这也成为“反服贸”运动的主要动机。“反服贸”人士极力强调民众享有的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不断称其“占领立法院”是因为运用体制内的手段已经无法阻止“服贸协议”在立法机构的通过,因此,“占领”行动不仅没有涉嫌违法,反而是维护民主之举。“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就认为,“政府不该为了一个弊大于利的经济协议出卖台湾的民主价值”,还在 Facebook 上发表声明,认为“服贸协议虽然宣称只开放 64 项服务业,但却从食衣住行、生老病死全都包含在开放项目清单里。担心除了饭碗难保,未来言论自由更可能受到威胁”。这种以捍卫所谓的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为动员诉求,有意淡化学生的违法行为,化解岛内舆论对“反服贸”运动正当性的质疑,甚至使“反服贸”运动具有了某种所谓“道德”高度。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反服贸”人士有意识地实施了“框架整合”,即通过“诊断框架”构建起了支持“反服贸”运动的认知逻辑,这种认知逻辑对“反服贸”运动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建立了“反服贸”运动的正当性基础;通过“处方框架”,则提出了“反服贸”运动的具体目标与策略,确保整个运动朝既定的方向发展;最后,组织者通过“动机框架”,进一步阐明了行动诉求的深层原因,构建参与者的响应。这种框架整合使得“太阳花”运动从认知、动机以及行动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运作体系,因而,能在短时期内将较为分散的参与者有效地动员起来,这也体现了框架整合的强大整合效果。

三、框架整合中的话语符号

“反服贸”人士在框架整合中使用了相应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有效地将民粹主义、“恐中一反中”、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等话语符号整合在一起,构建起完整的“反服贸”话语,推动了“反服贸”框架整合的形成。可以说,正是基于这套内部的话语符号,“反服贸”运动才能彰显强有力的动员效果。

(一) 对民主价值与言论自由的认可: 民主主义的捍卫

民主诉求本身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意识形态能够动员政治集团的所有成员采取集体行动”。^[23]政治转型以来,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在台湾社会已经成为普遍的主流民意,民主话语对青年群体更是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台湾青年大多出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尽管大多没有直接参与过台湾民主运动,但多数都对民主价值与言论自由持高度认可的态度。^[24]因此,“反服贸”人士将“服贸”视为程序不民主的产物,而“反服贸”就是要争取所谓的民主,这种将“反服贸”包装为“争

民主”的话语对台湾青年群体产生了强烈的动员效果。“反服贸”人士充分利用台湾社会共同认可的主流价值,不断制造和渲染捍卫所谓的民主观,“黑色岛国青年阵线”打出的旗号就是“退回服贸,捍卫民主”,公然主张“夺回立院,捍卫民主行动”,发起“330 捍卫民主、退回服贸、人民站出来”集结行动。“反服贸”人士就是试图用所谓维护台湾民主价值来制造强烈的动员诉求,因为对多数台湾民众而言,捍卫民主价值能唤起共同的集体记忆,任何破坏民主价值的行为都很容易激发公众强烈的意识形态情感,从而产生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同时,“反服贸”人士还在运动中借用了追求言论自由的情感诉求,广泛宣传“公民不服从主义”。在“反服贸”人士看来,“服贸协议”的签署是台湾当局“私下”与大陆方面协商的产物,充满了程序不透明化,不符合民主程序。台湾“公民觉醒联盟”发言人王孝成就质疑签署过程的瑕疵,没有考虑台湾和大陆之间竞争的关系,过程不透明,代表的是特定政党与少数群体的利益,基于“服贸协议”不符合民主程序,那么在“反服贸”人士看来,台湾民众则有抗议与不遵守的自由,因此,发起“反服贸”行动来表达抗议的主张,就是捍卫这种言论自由的体现。不仅如此,“反服贸”人士还大力渲染“服贸”会损害台湾出版与言论自由,^[25]依靠这种对所谓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宣传,“反服贸”人士坚称民主价值优于法律秩序,为“反服贸”行动寻找所谓的正当性,号召台湾民众直接占领立法机构,挑战法律秩序。

(二) 对所谓台湾利益的维护:民粹主义的发酵

在台湾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中,“爱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符号,“台湾利益至上”是组织者惯用的话语诉求。“爱台湾”的背后,渗透的是一种维护台湾本土利益的情感诉求,试图通过以所谓全体台湾人的名义,来捍卫台湾利益,从而激发参与者的行动响应。

“反服贸”人士一再宣称,“反服贸”并不是为了特定群体或私人的利益,而代表了全体台湾人民。“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宣言中,就提出“各位青年朋友,这些由大财团、大企业、少数执政者所组成的跨海峡政商统治集团,随时可以抛弃台湾,他们随时可以转往世界上任何一处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他们就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一个国家青年的血汗,就开始找寻其他国家青春的肉体。各位台湾的青年们,台湾是我们生活的土地、这是我们赖以维生的地方。为了阻止这个不公不义的经贸协议、为了阻止这个践踏制度、威权复辟的政党,请跟我们一起站出来,请跟我们一起站出来守护我们的台湾!”在这里,“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将“服贸协议”视为政商集团合作的产物,发起“反服贸”就是为反对少数既得利益群体,而捍卫台湾利益。组织者将少数既得利益群体与多数台湾民众区分开来,从而建构起行为正当性的话语论述。还有一些宣传公开表示“爱台湾,反服贸,站出来”,在这种话语论述中,组织者将“反服贸”与“爱台湾”粗暴地结合,构建起“反服贸”就是爱台湾的“假论述”。这种充满民粹主义的话语成为支撑“反服贸”运动的核心符号。

“反服贸”人士利用维护所谓台湾利益来制造极端的民粹主义,借此形成“亲中一反中”的话语体系。为了应对“亲中”,“反服贸”制造出“恐中”与“反中”,即认为“服贸”让两岸关系更加紧密,“亲中”会给台湾利益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害,由此,产生了“恐中”情绪;结合“亲中”与“恐中”,产生基于“服贸协议”的“反中”。尽管“反服贸”人士避免直接使用“反中”来进行社会动员,而是通过模糊化的技术性处理,形成了外层“恐中”与内层“反中”的动员架构,最终构建起了参与者对“服贸协议”的抗拒甚至愤怒。

(三) 对个人利益与生活方式的渲染:个人价值的追求

除了构建民主主义、民粹主义的话语符号之外,组织者还试图构建一种个人主义的话语符号。这种个人主义符号基于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主张尊重个体发展利益,强调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抗拒资本、市场全球化,追求自己的小幸福。

通过渲染两极化差距,制造捍卫个体利益的话语符号。近年来,随着台湾社会两极化趋势持续加大,社会弥漫着一种对财富分配不公的抗议情绪。“反服贸”人士就一再声称,“服贸”将会导致台湾中小阶层和青年人利益受损,因而主张捍卫个体利益。“服贸协议非蓝绿之争,是我人民生计和生活质量是否确保的问题,请大家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权益。”^[26]“反服贸”人士还不断强调“批发零售生活产

业将被陆资替代”“弱势产业将受冲击”“服务业劳工就业不保”“两岸开放不对等”等话语,刻意强调两岸“服贸协议”会严重影响中小群体与青年人的利益。这些典型的“中间偏左”论述观点和阶级政治动员话语,在台湾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经济民生连年凋敝的时代背景下,极易煽动民意形成“反服贸”的浪潮。^[27]

通过否定融入全球化的必要性,来维护“小确幸”的生活方式。随着台湾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诞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使得台湾社会可以维持相对安逸的生活模式,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青年群体中广为盛行。这种信奉“小确幸”的生活哲学对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持漠视和抗拒的心态,对资本、利润等话语充斥着负面的看法和评价,试图重新在社会分配、权利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议题上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官商集团总爱告诉人民,如果不想回到封闭经济,沦落于边沿化,就只有加入自由贸易的全球化。我们答复:不对,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争取在劳动/福利待遇上,以及在保护环境上,向最高标准看齐,这才是人民和地球的唯一出路。我们的确不要回到封闭经济,我们要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全球化。”^[28]“反服贸”人士还强调,只要没有财团资本的垄断,台湾是个可以让青年实现创业梦想,可以靠自己打拼就能变头家的创业天堂。在这里,青年人的“小确幸”生活方式被构建成一种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话语符号,突出的是微小、幸福、满足等情绪。可以看出,由于“反服贸”人士注重对青年人现有生活方式的维护,制造的“小确幸”话语符号获得了相当多台湾青年人的感性认同。

为了实现“反服贸”运动对各个阶层社会民众有效的集体动员,达成社会舆论在“反服贸”议题上的一致,“太阳花”运动建构了一个“框架整合”的动员模式。“框架整合”的核心由一套充满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体系构建,这些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在“框架整合”的基础上,在动机、策略以及正当性等方面建构起支持“反服贸”运动的动员机制,最终实现运动目标与诉求的一致,从而推动了“反服贸”的集体行动。可以发现,“反服贸”的“框架整合”过程一方面是对特定意识及其话语符号的整合与塑造,从而形成认同和支持“反服贸”的价值观与舆论;另一方面,“反服贸”也借助“框架整合”建构了一套推动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从而使得“反服贸”运动在短时期内爆发出强大的社会能量。

四、结 语

本文考察了“太阳花”运动组织者如何通过“框架整合”的形式,对相关的情感、话语进行系统构建,从而激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研究表明,岛内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有着很大的差异性,较多具有强烈的政治效能感,也容易受到情感、话语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依靠情感、话语的塑造来获得参与者的响应,进而促使集体行动的爆发。在“太阳花”运动中,情感、话语能构建起社会运动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动力机制,但从情感、话语层面转化为具体的集体行动,还需要特定组织联盟的策略运作,更需要社交媒体的传播串联,这就涉及到在大规模社会运动中,情感、话语与动员组织以及社交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即以情感、话语为主的“框架整合”如何在组织网络以及社交媒体的实际参与下,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对于这一点,有待以后的深入研究。

注释:

- [1] 参见姜南扬《台湾大转型》,台北:克宁出版社,1995年4月。
- [2] 参见萧新煌《台湾的地方环保抗争运动(1980—1996)》,香港: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1999年。
- [3] 何明修《自主与依赖:比较反核四运动与反美浓水库运动中的政治交换模式》,《台湾社会学刊》(台北)2003年第30期。
- [4] 参见陈平轩《从网络到街头:反国光的动员经验、成效与反省》,《台湾社会研究》(台北)2011年第85期。
- [5] 参见郑振清《台湾新世代社会运动中的“认同政治”与“阶级政治”》,《台湾研究》2015年第3期。
- [6] 参见信强《新媒体在“太阳花运动”中的动员与支持作用》,《台湾研究集刊》2014年第6期;汪子锡《E化民主的政策营销挑战分析:以反服贸学生运动新媒体运用为例》,《中国行政评论》2014年第6期;林泽民、苏彦斌:《台湾快闪政治——新媒体、政党与社会运动》,《台湾民主季刊》(台北)2015年第12卷2期。
- [7] 参见马锋《台湾“反服贸运动”看网络的社会动员》,《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2期。

- [8] “太阳花”运动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负责参与运作,但却有一个由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社运联盟,即“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这个联盟集合了包括“两岸协议监督联盟”“澄社”“1985 公民觉醒联盟”“台湾守护民主平台”“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劳工阵线”“妇女新知基金会”“台湾教授协会”等多个台湾社会团体。
- [9]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23页。
- [10] Goffman, Erving,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11] Snow, D. A. et al,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 51: 464-81.
- [12] Snow, D. A. and R. D. Benford,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988, 1: 197-219; Benford, Robert D. and David A. 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 26: 611-639.
- [13] 第十四场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公听会新闻稿,2014年1月2日。
- [14] 《台湾人为何反服贸不反麦当劳?》,《自由时报》(台北)评论,2014年3月28日。
- [15][17][21] 《318 青年占领“立法院” 反对黑箱服贸行动宣言》,http://www.workerdemo.org.hk/0001/20140324.01S.htm。
- [16] 《“黑岛青”敢冲 个个独当一面》,《苹果日报》(台北),2014年3月24日。
- [18] [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6月,第146页。
- [19] 《黑色岛国青年阵线:退回服贸 捍卫民主》,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1734。
- [20] 洪贞玲主编《我是公民也是媒体:太阳花与新媒体实践》,台北:网络与书出版公司,2015年5月,第72页。
- [22] 曾健民《反服贸声中 TPP 已上场》,《台湾立报》(台北),2014年4月2日。
- [23]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43页。
- [24] 在近年来的社会运动中,台湾青年积极参与洪仲丘受虐死亡、“军审法”修法问题及军中受难家属的协助等事件,其公民意识受到社会普遍关注。
- [25] 郑秀玲《两岸服贸协议对我国的冲击分析》,http://www.slideshare.net/showling/ss-25916125。
- [26] 公民觉醒联盟“黑箱服贸懒人包”,http://billy3321.github.io/tisa2/。
- [27] 郑振清《“反服贸”背后的贫富分化与阶级政治》,《文化纵横》,2014年第3期,第65页。
- [28] 《谴责台湾政府暴力清场 支持学生争取经贸由人民决定》,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1802。

(责任编辑:沈惠平)

The Framework Integration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the Mobi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in Taiwan

Ai Mingjiang

Abstract: Emotion and discours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movement. Organizers can achie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on emotion and discourse and ultimately the collective action through a specific “framework integra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by using certain “framework integration” modes including the “diagnosis framework”, “prescription framework” and “motivation framework” in the course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those for the “Anti Cross-Straits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integrate effectively all kinds of ideology and discourse that had formerly been dispersed and construct the identification and support of the emotion and discourse of the movement, thus promoting its outbreak. Undoubtedly, the reason why those against the Cross-Straits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could use the emotional discourse to mobilize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students in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movement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emotional discourse that social movement has constructed has struck a responsive chord in the hearts of the young students in the specific time and place.

Key Words: cross-Straits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Sunflower Movement, social mobilization